

luxun yu guomoruo
bijiao lun

鲁迅与郭沫若比较论

张 恩 和

天津人民出版社

鲁迅与郭沫若比较论

张恩和

•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香河延福屯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1.26印张 2插页 251千字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800

ISBN7-201-00162-0/1·9

定 价: 5.00元





目 录

导言：作为巨大文化现象的鲁迅和郭沫若

上 篇 总体比较

- 一、时代玉成..... (19)
- 二、地域环境..... (29)
- 三、家庭影响..... (40)
- 四、曲折经历..... (48)
- 五、友朋支持..... (59)

中 篇 平行比较

- 一、政治思想之比较 (77)
- 二、哲学思想之比较 (110)
- 三、文艺思想之比较 (143)
- 四、创作比较之一
——小说之比较..... (186)
- 五、创作比较之二
——杂文之比较..... (227)
- 六、创作比较之三
——散文之比较 (267)

七、创作比较之四

——诗歌之比较 (288)

下 篇 交叉比较

一、郭沫若的鲁迅观 (309)

二、鲁迅怎样对待郭沫若 (328)

附录 郭沫若对鲁迅运用语言的一个批评 (347)

后记

导言：作为巨大文化现象 的鲁迅和郭沫若

一

不管你承认或不承认，鲁迅和郭沫若都因其文学上取得卓越成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了最突出的地位；并且作为伟大的文化人物，他们的名字也已经载入了我们民族的和世界的文化史册。

这不是什么需要论争的问题，而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迄今乃至以后，对于鲁迅和郭沫若都会有不同的评价。但是，只要是理智的和尊重历史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一客观事实。

事实本身没有什么值得奇怪。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上下五千年，我们的民族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造就了许许多多的优秀人物，其中有不少已汇入了世界名人之列。

光从文学方面看，我们的民族是不乏伟大作家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和杰出的诗人、散文家、剧作家、小说家。其中有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陆游、辛弃疾、关汉卿、汤显祖、吴承恩、施耐庵、蒲松龄、曹雪芹……这些名字象浩瀚夜空中璀灿的明星，

照彻环宇。正是他们和其他众多的作家一道，构成了一部世界上年代最长，内容最丰富，色彩也最绚丽的文学史。这些作家已经或正在得到世界的承认。这自然引起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激发起人类文化的自觉意识。

历史进到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几千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西方的新思潮汹涌而来，（其中也包括后来指导我们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以“五四”时期高涨起的“科学”和“民主”两大旗帜为标记，中国真正认识了人类发展的大趋势，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尽管中国认识自己和认识世界开始带有很大的被动性，在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上起步太晚，速度也十分缓慢，并且伴有太多的血污和痛苦，但它毕竟是开始汇进了世界的潮流，和过去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的社会情况相比较，仍不能不承认它实际上是前所未有的加速度。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间发生的变化，是过去几十年、几百年也不可能有的。这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谈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所说的是“伟大的时代”，是一次中国“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历史事实证明，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是如此，在哲学、文学、艺术、历史等方面也是如此。

中国的新文学从一九一七年正式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算起，迄今只不过六、七十年的历史。这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就在整部中国文学史中也不过是一个短短的篇章。就在这不长的历史时期，新文学以它和过去文学迥异的特有的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以往任何时期的文学，都不

可能象新文学这样同波澜壮阔的现实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和人民大众共同着命运，并且文学样式和种类也空前发展了，而更主要的是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作家。这里有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叶绍钧、巴金、老舍、曹禺、艾青、丁玲、赵树理……毫无疑问，其中被人们公认为最突出的则是鲁迅和郭沫若。如果说，新文学因为有众多杰出的作家可谓是群星灿烂，鲁迅和郭沫若就是这群星中最耀眼的双子巨星。

鲁迅实际上是中国新文学之父。他的小说《狂人日记》是新文学的第一声春雷，由它呼唤和开创了中国文学一个全新的时代。自此以后，他披荆斩棘，辛勤耕耘了近二十年。他写了为数虽不算多但艺术成就最高的小说以及大量锋利、圆熟的杂文，创造性地使杂文成为新文学的一种特别样式。这一切，不但充分显示了新文学的业绩，也充实了中国文学的宝库，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鲁迅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和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对培养和带动一代作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明显，直到今天我们还从他的作品中吸取宝贵营养，把他看成民族的骄傲。早在四十多年前，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即对鲁迅作了全面的、科学的评价。他说：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

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毛泽东说的这一段话，无疑对我们正确认识和评价鲁迅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大体上和鲁迅同时登上新文坛的郭沫若，虽然他开始产生影响比鲁迅稍晚，影响的范围也略小，但他是实际意义上的新诗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他的诗集《女神》以崭新的内容和形式出现在读者面前。那昂奋的诗句不但激励了人们反抗封建压迫的斗争热情，也使僵直板涩和纤弱矫情的诗歌创作面目为之一新。此后，他虽然有一段时间从事实际斗争，又专注于历史考古领域，但始终坚持在文化战线上，在进步的文化界起了积极、重要的作用。邓小平在郭沫若逝世后举行的追悼会上致悼词说：

郭沫若同志是我国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他和鲁迅一样，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卓具的著名学者。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

应该说，这段话对郭沫若是一个十分合适的盖棺之论。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伟大的政治家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无论是毛泽东或邓小平都不是仅从文学的角度，更不是仅从政治的角度，而是从整个文化的角度对鲁迅和郭沫若给以估衡和评价的。毛泽东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是在文

化战线上”代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空前的民族英雄，说鲁迅的方向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邓小平说郭沫若“和鲁迅一样，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卓具的著名学者”，是“继鲁迅之后”的“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他们都高屋建瓴，选择了文化这一概括人类活动最本质的方面，从广阔的背景上来审视鲁迅、郭沫若的作用和意义，从而一下就达到最高的层次，得出了最深刻的结论。

事实也确是如此。从“文学革命”开始的思想启蒙运动，到“五四”时期达到了最高潮。这不仅是中国的一次文艺复兴运动，也是中国的一次文化复兴运动，一次全民族的大觉醒、大复兴的运动。振兴中华，走向世界，虽然在当时并未作为口号明确提出，但整个运动过程都贯穿了这一基本要求，并且作为时代精神一直承传和延续了下来。以“文学革命”为滥觞的中国现代文学只是整个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的也是十分活跃的部分，在整个文化运动中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来，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看，文化作为人类所特有的行为，一切和人类活动有关的都是文化现象。且不说文学本身是整个文化有机体中之重要一环，它包含的各种要素（诸如艺术形象中的生活方式、审美情趣、价值标准、情绪结构、风俗习惯等）都表现为一定的文化形态和文化心理，而且它又积极地影响社会文化心理，推动新的文化创造。就是说，文学作为人类的一种特殊精神活动方式，其影响所及决不限于这一活动方式本身，而是直接间接地广泛播及整个人类社会。因此，文学也是一种普遍的、重要的社会现象。这样看来，要真正认识鲁迅和郭沫若的意义，就不能仅仅从文学的角度，更不能仅仅从政治的角度，而应该

从文化这一带根本性的审视点去加以考察，庶几才能揭示出他们最大的价值和作用。显然，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着眼点正是如此；在他们看来，鲁迅和郭沫若的最大贡献首先不是在文学上，而是对于文化整体的影响，在于作为壮美的文化现象，代表了我国民族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的历史发展方向。

应该指出，这并不是说鲁迅和郭沫若创造了历史，也不是把他们看成高不可攀的神话人物。还是一九二六年，鲁迅就在《写在〈坟〉后面》中提出了一个所谓“中间物”的概念，意在说明自己的地位和作用，不过象“一切事物”“在转变中”的一环。他的原意是在否定自己被人看作“什么前涂的目标、范本”。显然他并不看重这“中间物”的地位和作用；以后的研究者也不大注意这“中间物”的意义，甚至一直对这带进化论色彩的观点持批判态度。其实，“中间物”并非仅仅是进化论的一个观点，更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文化的概念。用生物进化的观点来观察分析人类社会显然是不够的，甚至是错误的；鲁迅在经过事实的教训后也断然纠正了自己“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但是，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从全部人类文化活动的演进看，“中间物”又是客观的真理。鲁迅所谓“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任何人事在人类历史和文化发展过程中都“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承先启后”或“承上启下”的意思。人类历史的发展亦即文化演进是无止境，也不会中断的，“承先启后”或“承上启下”就是普遍的、在在可见的现象。任何伟大人物的价值和作用莫过于他真正成为“进化链子”上的“中间物”，成为“桥梁中的一木一石”。从来就没有什么神仙人物；创造历史也并不是靠某一个人。鲁迅、郭沫若的价值和作用，恰在他们

处在中国文化的转换期而能以其高度的自觉积极努力地促进了这一转换，从而真正成为了中国文化由前现代化向现代化转换这一关结点上的“中间物”。

二

当然，鲁迅和郭沫若又毕竟是伟大的文学家；他们对整个民族文化的影响和作用主要是通过自己的文学活动（又主要是文学创作）实现的。他们和一般的思想家、革命家，和在哲学、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出现的“巨人”又有所不同。

二十世纪对于世界人类是进步的世纪，开放的世纪，也是人类文化大竞争、大搏斗、大汇合、大交流的世纪。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古老文化的民族来说，更是处在有关生死存亡的交叉路口。就是说，面对这一世界形势，中国的民族文化如何既不失去其固有之血脉，又大量吸收新鲜的血液，既不使自己载载孑立，被时代所抛弃，又不因随波逐流，被外来文化所淹没，这对民族文化的发展确是至关重要的时刻。世界性的现代的大工业生产必然地要冲破各个民族的界限。这是不随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毫不留情的、有时甚至是非常严酷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更指出：“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这当然是从积极的方面而言，是肯定人类文化发展的大方向。这说明，世界上的各民族都有可能利用现代化的手段和已经建立起来的广泛联系充分地发展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但是，这里也向人们提出了

问题，即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之前）如何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的个性和独立，在人类文化的发展中做出自己的特殊贡献。从民族文化学的观点看，任何民族的文化都含有两种内在机制：一是固本机制即保持其本民族特质不易变动，一是突发机制即促使其自身不断发展变革。一个民族的文化能否永不停止地新陈代谢，在新的世界潮流中获得生命力，关键在于这两种机制自我调适功能是否正常，是否健全。其中任何一种机制功能的失调或两种机制出现的不平衡，都将危及民族文化的生存发展。显然，中国在进入二十世纪后，是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的；它在世界现代文明旋风的袭击下，自觉和不自觉地进行了自我调适，开始弃旧图新。这在文学上首先就表现为“文学革命”的提出；而鲁迅和郭沫若就是在“文学革命”中涌现出的主将、闯将，并且自此以后，一直在文学战线上筚路蓝缕，纵横驰骋，适时地把握和推进了文学的转机。具体言之，这就是一面立足于民族传统，不断地促使它现代化，一面伸手向外，大胆地吸收外国文学，使其民族化后变为对自己有益的营养。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历史恰证明了鲁迅、郭沫若的这一辛勤努力。

和一般的文学家也有所不同，鲁迅和郭沫若在文学以至学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可以说在他们之前和以后至今，均无出其右者。鲁迅不但是小说家、杂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也是文学史家、文物鉴赏家，更不用说他早期也是一位自然科学家和科学史家。郭沫若不但是诗人、散文家、剧作家，也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他创造性地把古文字学和古代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他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包括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学、考

古学、金文甲骨文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外国进步文艺的翻译介绍等方面，都有重要建树”。^①这当然表明了他们和一般人不同的特异的资质，但更重要的是表明了时代对于“巨人”的呼唤，表明了由“文学革命”开始的二十世纪中国文艺复兴、文化复兴运动的历史需要。作为一种伟大独特的文化现象，这也许只能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去找到解释和类比。当时，一些伟大的知名人物都努力争取而且事实上成为了文化的多面手。就象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所指出的：

“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几个创作领域里〔而且不仅在理论生活中，并且还在实际生活中极其出色地〕放射出光芒。”他列举出达·芬奇不仅是伟大的画家，而且是伟大的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阿尔勃莱希特·丢勒是画家、铜版雕刻家、塑像家、建筑家，此外还发明了一种筑城学体系；马基雅弗里是政治家、历史家、诗人，又是“第一个值得一提的近代军事著作家；路得
“不但扫清了教会的积秽，而且也扫清了德国语言的积秽，创造了近代德国的散文和撰写了那成为十六世纪的《马赛曲》的充满胜利信心的圣歌的歌词和曲调。”对此，恩格斯解释说：

“那时的人们还未成为分工的奴隶，而分工的那种使人受到限制的、使人片面化的影响，在他们的后继者那里我们是常常看得到的。但是他们的特征就在于，他们几乎全都在时代运动中和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个或那个党派方面进行斗争，有些人用笔和舌，有些人用剑，还有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满和坚强。”自然，发生于二十世纪的中国文艺复兴、文化复兴和几百年前的欧洲

① 邓小平《在郭沫若同志追悼会的悼词》。

文艺复兴并不相同，鲁迅、郭沫若也不能和达·芬奇、阿尔勃莱希特·丢勒等作简单的类比，但从他们某种程度的相似中，我们可以看到同是作为伟大文化现象的一定的历史原因。

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无论是鲁迅或郭沫若，在他们生前死后，都遭受到一些人的贬抑和攻击，更不用说一些横加的曲解和批判（不同的评价和正常的歧议当不在此列）。他们骂鲁迅“投机”、“存领袖之欲”，是“堕落文人”，说鲁迅的杂文“不三不四，毫无价值”，甚至诬蔑鲁迅拿卢布，是汉奸。特别是，他们从一定政治立场出发，一再强调“鲁迅是共产政权的桥梁，是共产政权的象征”，妄图以此贬低和否定鲁迅。一直到近年，还有人说鲁迅是“被人为地抬高了”，“头上被加上了光环”，说他的作品尤其是杂文“只有政治没有艺术”，“许多经不起推敲”。至于郭沫若，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所遭受的政治迫害且不说，就在他逝世后，还有人骂他“谄媚”，是“宫廷侍臣”，而对他的生活品格就更有一些流言蜚语，好心者求全责备，平庸者吹毛求疵，恶意者肆加攻击。这里，我们无意把鲁迅和郭沫若视为神明，认为他们都十全十美，毫无缺点；无论鲁迅或郭沫若，他们都是人而不是神，而人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局限。问题是我们应该从什么样的角度、怎样去看待这两位文化巨人。鲁迅在一九二五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及为民国建立而牺牲的先烈所写的文章中，有一段话可作我们认识、评价鲁迅和郭沫若的借鉴。他说：

Schopenhauer（按即叔本华——引者）说过这样的话：要估定人的伟大，则精神上的大和体格上的大，那法则完全相反。后者距离愈远即愈小，前者却见得愈大。

正因为近则愈小，而且愈看见缺点和创伤，所以他就和我们一样，不是神道，不是妖怪，不是异兽。他仍然是人，不过如此。但也惟其如此，所以他是伟大的人^①。

著名作家郁达夫在鲁迅逝世时也说过一段极富深意的话，这段话是：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②。

这确实值得我们再三深思！

三

应该承认，几十年来对鲁迅的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研究者对鲁迅的思想、小说、杂文、散文、旧体诗以及日记、书信等都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对鲁迅与时代社会、古代文化及外国文学的关系也作了相当充分的论述；与此同时，又陆续发掘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现在，关于鲁迅研究的研究也开始为人们所注意，有人已写出鲁迅研究史。英国人颇以莎士比亚研究的成果而自豪，说：研究莎士比亚的书可以装备一个图书馆。这话虽不无夸张，然事实是对莎士比亚的研究确已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莎士比亚学，研究论著之丰已很难统计。鲁迅的研究比之莎士比亚研究，历史要短得多，

① 《战士和苍蝇》，《鲁迅全集》第3卷第30页。

② 《怀鲁迅》。